

中华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民族服饰文化交融——以清代云南武定彝族服饰为例

刘乐瑶¹, 王羿^{2*}

1.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2.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云南武定地区的彝族服饰, 鲜明地承袭并展现了彝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风貌, 更是博采众长、相融相通的典范。基于相关文献与实地考察, 以云南省武定县彝族传统女服为研究对象, 从文化背景、服饰形制、纹样装饰、服饰工艺等方面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重点探索清代云南社会变迁之下民族文化交融对武定彝族服饰的影响。云南武定彝族服饰通过结构形制的共享、纹样装饰的交流和工艺技术的融汇, 丰富着彝族服饰文化, 展现了西南民族地区以服饰作为文化媒介, 在物质、精神文化层面与外界不断汇聚交流, 进而达成深刻文化认同与共享的现象。

关键词: 武定; 彝族; 中华文化认同; 服饰; 结构; 纹样; 工艺

中图分类号: J52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6946(2025)01-0041-10

DOI: 10.19798/j.cnki.2096-6946.2025.01.005

Mutual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Costum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with Costume of the Yi Ethnic Group in Wuding, Yunn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LIU Leyao¹, WANG Yi^{2*}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Yi ethnic costume in Wuding, Yunnan vividly inherits and showcases the profound heritage and unique style of Yi culture, and is also a model of ethnic cultural exchange, mutual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Based on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this study takes the traditional women's costume of the Yi ethnic group in Wudi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it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background, costume form, pattern decoration, and costume craftsmanship, with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ethnic cultural integration on the costume of the Yi ethnic group in Wuding under the social changes in Yunn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costume of the Yi ethnic group in Wuding, Yunnan enriches the culture of Yi costume through the sharing of structural forms, the exchange of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raftsmanship and technology. It demonstrates the continuous convergence and exchange of costume as a cultural medium between the Southwest ethnic region and the outside world in terms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ulture, and thus achieves profou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sharing.

Key words: Wuding; Yi ethnic group;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costume; structure; pattern; workmanship

收稿日期: 2024-09-11

基金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 2024 年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 (BZKY2024118)

*通信作者

在漫长的岁月中,彝族先民不断地迁徙、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了今日鲜活的彝族文化。作为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定彝族服饰不仅体现了本民族鲜明的特色,同时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吸纳和融入外来文化,以相互包容、共同创造的方式蓬勃生长。文献记载了清代云南民族杂居共存中,外来文化对彝族风俗服饰影响的相关描述。《风俗》中:“自城郭以至乡村,凡冠、婚、表、祭,多遵用朱子‘四礼’。其衣冠、服饰,因时制宜,家无殊俗^[1]。”《漫游散记》中记载武定彝族土司夫人:“她已着了盛装……身上穿一件蓝色绸衫,两袖露出红色的紧身;下边是百褶裙子,真可算是彝汉合璧的装束^[2]。”可见,武定彝族服饰在保留了彝族传统风俗的同时,更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集中展现了彝族与汉族为主的族际文化上的交汇,以及共创中华文化的历史事实。故而,探索清代云南社会变迁之下民族文化交流对武定彝族服饰的影响,可为各民族艺术间交流交融的路径梳理、强化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效指引。

一、云南武定彝族及其服饰文化概况

(一) 云南武定彝族历史源流

武定县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北部,从古至今便是出滇入蜀的重镇要塞,被称为“省会之藩篱,滇西之右臂”^[3]。史书记载,数千年前彝族先祖阿普笃慕因为洪水而迁居至洛尼山避难,待他的六个儿子长大成人,又开启新一轮的迁徙,史称“六祖分支”^[4]。其中两子慕阿克、慕阿齐发展成为默部、布部两个支系,经过漫长迁徙后定居于现在武定、禄劝和东川一带,世代繁衍生息。

秦汉时期,迁徙而来的武定禄劝一带彝人逐渐形成了以武定发窝大黑山和禄劝云龙为中心的新兴族群部落,其部落首领名为“罗婺”。由于他智慧过人、治内攻外,其孙法瓦浸盛将日益强大的彝族部落以远祖罗婺为部名,这便是彝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武定“罗婺部”。作为唐代东方乌蛮三十七部中重要的军事力量,迅速崛起的武定彝族“吞并诸蛮部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5],并长期统治着云南北部。其势力范围以武定、禄劝为中心,东至寻甸、西至元谋,成为云南彝族当时实力最强盛的部族。

如今,彝族作为武定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共有六个支系,分别为纳苏、纳罗、罗罗、密岔、乃苏、撒尼,他们用勤劳和智慧继承和弘扬厚重辉煌的罗婺文化,并共同缔

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推动着其不断发展。

(二) 清代武定彝族女性服饰文化特征

明清时期,随着地方志和图志的发展,关于彝族服饰特征的图文记载十分丰富。《皇清职贡图》中《武定等府罗婺蛮妇》载:“……妇女辫发垂肩,饰以珠石,短衣长裙,皆染皂色,其地产火草,绩而为布,理粗质坚,衣服之余或贸于市。^[6]”配图所见妇人身着右衽大襟长衫(见图1),腰间系带,下着及踝细褶裙。《清代民族图志》中记载罗婺:“妇女辫发两绺垂肩上,杂以砗磲瓔珞,方领黑衣,长裙跣足。^[7]”配图中妇人身着褐色长衫,下着红色细褶百褶裙,青布包头(见图2)。可见,清代武定彝族整体保持着上衣下裙、披牛羊皮的服饰特征。

清末武定彝族传统女性服饰由上衣、套袖、百褶裙、绣花鞋组成(见图3),全套为棉布质地,上衣为右衽大襟长衫,衣长及臀,袖身宽大,下着百褶裙。这一服饰组合延续至20世纪上半叶,成为武定彝族女性最常见的服饰造型。图4为清代(19世纪末)武定万德乡彝族土司贵族盛装,由上衣、坎肩、百褶裙、三角包组成。上衣为圆领右衽大襟,袖身宽大,衣身为提花暗纹绸缎。外罩黑色素缎圆领无袖坎肩,下装为浅蓝色素缎百褶裙,腰系三角包。服饰中的长衫、坎肩为汉族风格,三角包、百褶裙则为最具代表性的彝族款式,但在面料的选择上又以绸缎取代了彝族百褶裙传统的羊毛织造,整体服饰在承袭了彝族古老传统的同时呈现出明显的包容性。

二、云南武定彝族服饰中文化交融的多维呈现

(一) 服饰结构形制中的共通

中国传统服饰通常采用平面直线剪裁,其固有的原始结构状态是以通袖线和前后中心线为轴线的“十”字形平



图1 《武定等府罗婺蛮妇》^①



图2 《罗婺妇》^②

① 《武定等府罗婺蛮妇》,图片来源于《皇清职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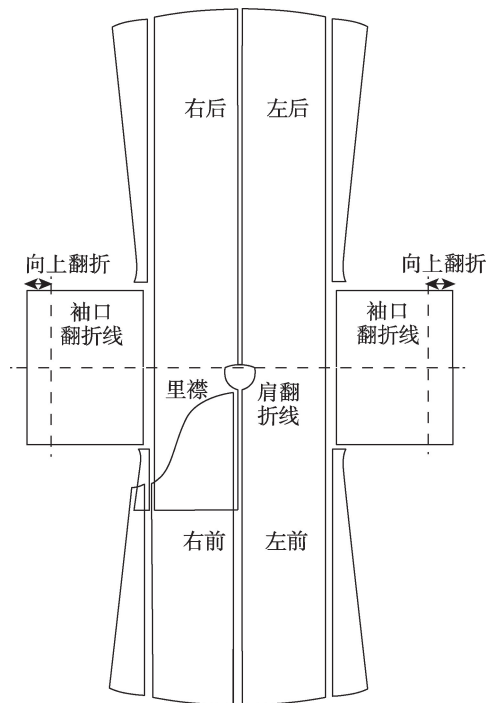
② 《罗婺妇》,图片来源于《清代民族图志》。

图3 清末民初武定彝族女性日常服饰³图4 清末武定万德乡彝族土司贵族盛装服饰⁴图5 清末民初武定彝族女性服饰⁵

面结构。《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中提出平面“十”字形结构是中华民族服饰的共同基因：“这种典型的华夏服饰文明同样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服饰体系”^{[8]6}，云南武定彝族服饰也包括其中。

服饰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促成了本质统一而又表现出多元化特点的中华服饰文明。在对纳西族、哈尼族、傣彝、撒尼彝等南方少数民族服饰结构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刘瑞璞教授提出：“这些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共同特点是右衽、偏襟且有里襟，这是北方汉族传统大襟袍服的典型特征，呈现出亲近北方形制的“十”字形平面结构”^{[8]23}。清代武定彝族女子服饰上衣展开后同样为典型的右衽、偏襟且有里襟的传统“十”字形平面结构。以清末民初楚雄武定彝族女性服饰（见图5-6）和清末楚雄汉族女性服饰（见图7-8）为例，二者皆是右衽偏襟，前后中破缝，整体结构保持着以肩线为中心前后连裁的“十”字组合，左右衣片皆为一个自然幅宽，以此形成“布幅决定结构形态”^[9]的特征，提高面料的利用率。这一结构也一直延续至近现代彝族女性服饰之中，可见中华服饰体系对武定彝族服饰的深刻影响。

在保持衣身主体“十”字形结构之外，武定彝族女服的衣袖和侧插片则是单独裁剪，通过接袖和加拼侧衣片的方式弥补袖长、实现胸臀摆量的增加。同时，上衣的里襟也极短，在前襟恰能遮挡处的衣侧横断，节省面料的同时保证了外观的完整性。这些结构上的细节，共同目的都是保证衣身实用性并最大化地利用碎余面料而减少浪费。这一点在与武定仅一江之隔的四川凉山彝族中也有

图6 清末民初武定彝族女性服饰结构图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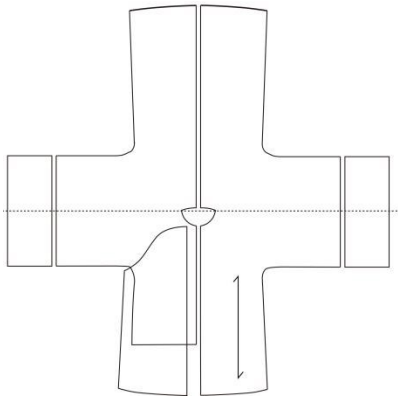
所体现。如表1所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作为彝族传统文化保留最完整的地区，当地彝族女性服饰同样采用“十”字形连身通裁式样，但细节上与武定彝族又有细微的差别。因其地处高寒山区，以畜牧为生，服饰宽大修长，衣长及膝，袖长掩指，对身体包裹度较高，且大多在前后衣身中部高开衩，减少前摆对双腿的束缚来满足畜牧生产的活动，在满足劳动与舒适的需求时降低衣服的淘汰率。而两地彝族在服饰结构上的共通之处，充分展现

³ 清末民初武定彝族女性日常服饰，为武定彝族乃苏支系女性穿着。作者拍摄于云南楚雄州武定县，2024年。

⁴ 清末武定万德乡彝族土司贵族盛装服饰，为武定彝族纳苏支系女性穿着，服饰通身为绸缎质地，用料讲究，华丽贵气，是武定彝族统治阶级财富与地位的象征。作者拍摄于云南楚雄州，2022年。

⁵ 清末民初武定彝族女性服饰，作者拍摄于云南楚雄州武定县，2024年。

⁶ 清末民初武定彝族女性服饰结构图，作者绘制。

图7 清末楚雄州汉族女性服饰^⑦图8 清末楚雄州汉族女性服饰结构图^⑧

了在“敬物崇俭”观念下中华民族服饰共同的文化基因和不同社会环境下多元表征的文化特质。

文化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对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尽管在细节部分的呈现方式上有所差异,但武定彝族服饰的结构裁剪无论是结构的整一还是细节的碎拼,都是基于敬物、节约这种强烈的集体自然观,这正与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中“节俭与敬物”的理念不谋而合,也是中华民族服饰大一统状态下求同存异和文化交融的结果。

(二) 服饰纹样装饰中的交流

“符号亦是文化,以可观、可触、可感的方式激活人们的民族情感与观念,用想象的一致性整合分散和破碎的经验,融合为中华文化符号体系^[10]。”在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强烈的文化认同之下,武定彝族服饰纹样也经历了从“族源记忆”到“共生共荣”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博大的开放性、包容性。

服饰不只是遮身蔽体的实用品,在装饰上同样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是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经济的表达。以四川凉山彝族为例,凉山彝族信奉“人间母亲大,畜牧绵羊大”,受到山地耕牧型的生活方式影响,服饰纹样以羊角纹、牛角纹、火焰纹为主,最大程度地保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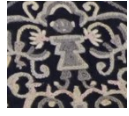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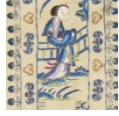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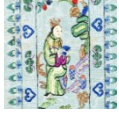
表1 清末川、滇彝族聚居区女性服饰结构比较分析

样本	图片	主结构分片图	特征
四川凉山美姑彝族女性服饰			典型“十”字形平面结构,交领大襟上衣,衣长及膝,袖长掩指,前后衣身布片中心破缝并高开衩,衣身为两片整幅面料
云南楚雄武定彝族女性服饰			典型“十”字形平面结构,交领大襟上衣,接袖,衣身为两片整幅面料

^⑦ 清末楚雄州汉族女性服饰,作者拍摄于云南楚雄州博物馆,2024年。

^⑧ 清末楚雄州汉族女性服饰结构图,作者绘制。

表2 武定彝族服饰纹样与汉族传统纹样的交流与衍化

时间	纹样	彝族传统纹样	汉族传统纹样	武定彝族纹样衍化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	蝴蝶纹			
	莲花纹			
	禽鸟纹			
	人物纹			

传统彝族服饰的特点。而云南武定彝族受到丘陵稻作型为主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影响,除了彝族传统的羊角纹以外,纹样题材的来源则多来自云南彝族生产生活的常见物象,以马缨花、八角花、四方八虎纹、人形跌脚纹、石刀花等传统纹样为主。如马缨花作为云南彝族生活中常见的植物,色彩艳丽的同时还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更是彝族传说中勇敢女性咪依噜的化身;人形跌脚纹中牵着手跳“跌脚舞”的人物与云南彝族的迁徙历史相关,象征着族群的生存繁衍;这些纹样都是云南彝族共同的文化基因与族源记忆,并以纹样的方式在服饰中呈现。

凉山地区天险阻隔,长期闭塞,因此,凉山彝族服饰中以羊角纹、火焰纹为代表的由集体无意识创造并传承下来的纹样组合至今仍盛传不衰。而与之相反的是,武定作为“滇中走廊、川滇通道”,民族呈交错分布状态,武定彝族服饰纹样的题材与风格不仅在纵向发展中坚守着本民族的先祖记忆和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在横向方面受到社会生活等现实因素和其他民族文化因子的影响,承载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中所产生的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取向,成为群体广泛认同的精神纽带和文化形式。随着清代市民文化的发展,武定彝族服饰中与世俗生活相关的人物形象题材明显增多,并更注重纹样所代表的吉祥寓意。以清末武定彝族女性盛装中的纹样为例(见图9),人物头饰金冠,颈戴项圈,闲坐在亭台院廊之中,反映了彝族上层社会生活的闲情逸趣,相比表2中主要采用抽象

几何、简洁夸张的方式来呈现的彝族传统人物纹样,武定彝族纹样风格更加轻盈雅致,对于特征的描绘也更加生动传神。这一风格的变化同样也体现在蝴蝶纹、禽鸟纹等花果植物、鸟兽鱼虫纹样中。在日常服饰之中,则是出现了以寿字纹为代表的文字类吉祥纹样。清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盛行一种由蝙蝠、团寿象征福寿的组合纹样,进而推动寿字纹在包括织绣品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应用。在武定彝族服饰之中同样出现了此类篆体寿字纹(见图10),多分布在服饰的门襟和袖口装饰处,调整了部分笔画使上半部分呈开放的“十”字,寓意着“寿限无头”,并常与“卍”字纹相结合,寓意福无止境。可见,武定彝族服饰纹样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与中华文化“求生存、祝长寿、逐福禄”的审美意趣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这种对共同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追求的认可和赞同,实际也包含着对中华文化



图9 清末武定彝族服饰中的人物形象^⑨

⑨ 清末武定彝族服饰中的人物形象,作者拍摄于云南楚雄州,2022年。

图10 清末武定彝族服饰中的“寿字纹”^⑩图11 清末武定彝族服饰中的“佛八宝”^⑪图12 清末武定彝族服饰中的“暗八仙”^⑫

的归属与认同。

图腾崇拜、灵物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形式的原始宗教一直广泛存在于彝族社会，成为武定彝族自古以来宗教信仰的主要形式。但随着佛、道教的传入和大批汉族的迁入定居，彝族的原始信仰逐渐吸收融合了佛、道教和汉族信仰的神祇。武定彝族接受佛教肇自明代指空禅师。指空游方至武定狮山，“绝粒危坐，肋不粘席，开辟正觉”^[11]，他历经六年扩建佛殿、僧堂等建筑，使得狮山正续寺自此香火数百年不绝。武定土官知府金甸也曾于狮山建二浮屠。这种宗教文化上的交流，同样对武定彝族服饰中的纹样题材产生了影响。除了文字纹样外，武定彝族服饰同样出现了以佛八宝、暗八仙为代表的宗教吉祥纹样。佛八宝又称八吉祥，八种吉祥物分别代表佛的八个部位。这一类型的纹样主要出现在武定彝族服饰衣身及后背纹样中。衣身的八吉祥纹样为提花暗纹，而后背的则为织金刺绣，皆可辨出宝瓶、双鱼、华盖、莲花、盘长等八吉祥纹样（见图11）。暗八仙又称道八宝，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道家的宝扇、葫芦、莲花、横笛等八件法宝。明清时期，云南道教兴盛，昆明地区部分彝族毕摩甚至自称太上老君的弟子。武定彝文文献《劝善经》便是对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的翻译与解读，反映了彝族积极吸收和借鉴道家的思想，更体现彝汉文化之间的交流。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暗八仙也从民间神话传说中道教八位仙人所持有的法宝变成了服饰等工艺品中重要的装饰纹样。暗八仙纹主要应用于武定彝族服饰衣身的提花暗纹中，结合祥云、飘带等作为祝寿纹样进行组合使用（见图12），寓意飞升成仙、群仙毕至，反映了民众对长寿这一永恒主题的不懈追求。这些赐福泽世的神灵很好地契合了彝族人民追求人畜平安的愿望和趋利避害的诉求，既调和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彰显了彝族文化的兼容性和多元

化特点。而无论是吉祥文字还是佛道教文化信仰中常见的各类神灵在武定彝族服饰中的出现，都是武定彝族与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图像化表达与物化实证，也是中华民族愿意共同传承和发扬的文化精神和情感态度，在共通的文化符号向共享的文化符号演变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逐渐得到了强化。

（三）服饰工艺技术中的融汇

“民族刺绣及其图案不仅承载着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精神纽带，还具有增强凝聚力、培育核心价值观、加深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12]。”武定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地带，清代中叶以后，大量汉族人口迁入，与彝族交错杂居，互相学习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因此，武定彝族服饰中的装饰及织造工艺不仅蕴含着本民族的风格，而且展现着中华民族共享的工艺符号在不同艺术实践、生活实践下的表达与演变。这种对本族文化的持守和对其他民族艺术表达的借鉴与交融，是在中华文化认同之下开放、包容心态的生动例证。

武定彝族常见的刺绣工艺有平绣、包绣、镶绣、堆绣、盘花与贴花等（见图13），然而在各民族交往之中，其工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呈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其中以武定彝族服饰中出现的盘金绣与三蓝绣为代表。秦及西汉早期金线便开始用于纺织物中，在封建集权达到鼎盛的清代，以苏绣中的盘金技艺最为成熟。苏绣中的盘金绣讲究金线粗细均匀，图案绣制完成之后再运用盘金绣技法围绣在图案外围，形成金边^[13]。然而由于盘金绣的原料昂贵，所以它大部分运用于官府等统治阶级和贵族的服饰中。武定彝族土司盛装之中的盘金绣工艺，与苏绣中的盘金绣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图14中通过盘金绣来勾勒人物衣着配饰和凤鸟的外围，盘金以双金线为主，两根金线并在

^⑩ 清末武定彝族服饰中的“寿字纹”，作者拍摄于云南武定县，2024年。

^⑪ 清末武定彝族服饰中的“佛八宝”，作者拍摄于云南武定县，2024年。

^⑫ 清末武定彝族服饰中的“暗八仙”，图片来源于《中国彝族传统服饰图典》中十九世纪末武定县彝族纳苏支系女服。

图13 清末武定彝族传统刺绣^⑬图14 清末武定彝族服饰中的盘金工艺^⑭图15 清末武定彝族女服中的三蓝绣工艺^⑮

一起作为明线,沿着纹样放好压平,再用颜色相近的钉缝线作为暗线将金线固定在织物上,金线盘绕不仅强化了视觉效果,还表现出彝族社会中热闹的场面,展现了武定彝族与清代贵族、汉民族之间隐性的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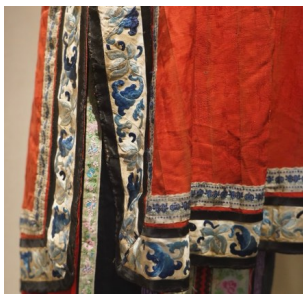
三蓝绣工艺也是武定彝族服饰工艺中十分独特的一种。在清末武定彝族女服中(见图15),下摆、门襟的边饰便主要用盘金绣及三蓝绣表现,以不同的蓝色织绣出蝶恋花纹、缠枝花卉和四君子纹样,并用盘金绣出枝叶环绕

其上。三蓝绣是清代苏绣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之一,是受青花瓷颜色影响专门针对刺绣配色技法来命名的绣种,并在具有浓厚士人文化的绣画基础上日渐成熟,不仅常出现在清代宫廷女子服饰中,在清代楚雄州汉族女服中也十分常见(见图16)。可见,武定彝族服饰中的工艺技术不仅承袭了本民族的传统,同样包含着武定彝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对多元文化的认知和接纳,而这种包容的多向交流,才能产生情感的联结和内心的共

⑬ 清末武定彝族传统刺绣,主要纹样包括彝族传统的羊角纹、马缨花纹、石榴纹、铜钱纹、蝴蝶纹等,采用的工艺主要为平绣和贴布绣,作者拍摄于贵州凯里,2024年。

⑭ 清末武定彝族服饰中的盘金工艺,分别来自武定彝族女衫袖口及坎肩上的刺绣纹饰,作者拍摄于云南楚雄州及武定县,2024年。

⑮ 清末武定彝族女服中的三蓝绣工艺,为武定万德乡彝族土司女服坎肩上的刺绣装饰,以三蓝绣工艺绣制缠枝花卉纹、亭台纹、虫鸟纹等,其中蝴蝶纹与衣襟处的寿字、卍字纹组合,寓意“万寿福”。作者拍摄于云南楚雄州,2022年。

图16 清末楚雄州汉族女性服饰中的三蓝绣工艺^⑩图17 清代武定县女士司绣蟒纹官袍^⑪图18 清末武定县彝族丝绸女褂^⑫

鸣,进而形成较为稳固的中华文化认同。

在服饰材料的选择上,土麻布、火草布的制作以及羊毛等擀毡制品的加工是武定彝族的传统手工业。然而在清代,武定彝族蚕桑纺织技术也在各民族的沟通交往中不断发展,《光绪武定直隶州志》记载“彝俗,旧不务蚕桑纺织,知府王清贤设法委曲教导之,始稍知习业。”蚕桑纺织品开始逐渐被用于服饰之中,但受到了气候和技术水平的制约:“外省多以四十余日始上箔作茧,武属间有饲蚕者,仅廿余日而蚕已老,故丝不能佳。岂天气限之耶?^{[14]351}”因此,土棉布和质地精美的丝绸大多由官府和产棉花地区民族制作,并通过贸易方式流通至武定。这些质地精美而产量稀少的绸缎较多地出现在武定彝族上层或贵族服饰之中,成了工艺与财富的代表(见图17~18)。

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原初生成,而长期历史进程中民族关系的发展,则是民族文化发展与演变的再生动力。武定彝族在服饰结构上延续了“十”字形结构这一中华民族服饰的共同基因;在服饰纹样上,它既保留了彝族在自然环境与原始宗教影响下产生的传统纹样,也发展出了在社会交往与人文环境等因素影响之下的吉祥纹样,成为了武定彝族文化对外交流与交往的实证;而在服饰工艺中,以三蓝绣、盘金绣为代表的服饰工艺,更是武定彝族包容心态的生动例证。可见武定彝族服饰在承袭民族之根的基础上,将其他民族文化不断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承载着彝族人代代相传、深沉饱满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也展现着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交融汇聚的格局。

三、云南武定彝族服饰中文化交融的生成缘由

(一) 人口流动推动文化交流

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文化的交流交融,常以

族群的活动区域和人口的流动迁徙为视角和前提。清代西南地区的各族际移民打破了云南当地民族原已存在的、相对固定和封闭的民族地域,逐渐形成了以“彝汉共居”为主、各民族杂居的局面。

云南地区能形成如此牢固统一的整体格局,主要原因在于中央王朝政策推动以及民间多形式的社会生产生活带来的人口流动。清朝时期,明代西南地区政策性的移民逐渐变成了政治、经济互补性条件下产生的自发移民。清代云南主张推行军事屯田与宽松的募民垦荒政策,“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悉听本地民夷垦种^[15]。”同时,云贵总督提出鼓励民间开采矿业政策以带动云南社会的发展,“广示招徕,或本地殷实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贾,悉听自行开采^[16]。”大量人口加入矿冶和商贸的队伍中来,汉族人口也逐渐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扩散。《光绪武定直隶州志》记载了清代武定人口的变化:“武属多为彝蛮诸蛮所居,明初役江南北富户实武定、永昌,汉人稍来,编户然亦不过十之一二。”其中武定州“原额丁四百八十九丁于武。”道光年间,武定州“实在土著屯户七千三百三十六户,男妇大小屯丁四万七千六百七十四人。”光绪年间更是“查明通州八千四百六十户,二万一千一十三丁^{[14]363}。”政策与经济推动下的人口迁移,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更加密切,清代云南彝区一时间“至于歇店饭铺、估客厂民以及夷寨中客商铺户,皆江西、楚南两省之人……以至积攒成家、娶妻置产,虽穷乡僻壤,无不有此两省人混迹其间^[17]。”

服饰文化的碰撞带来的是多样共存局面的形成。《姚州志》中如此形容云南彝汉相容的场景:“彝种有七,居近城郭与汉彝杂处者……后皆汉化,衣服饮食渐与汉彝相同。^[18]”可见,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带来了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互相交流与发展,对武定乃至整个云南彝族经济文化

^⑩ 清末楚雄州汉族女性服饰中的三蓝绣工艺,作者拍摄于云南楚雄州博物馆,2024年。

^⑪ 清代武定县女士司绣蟒纹官袍,征集于武定县万德乡,是见证云南清代土司制度珍贵的传世实物。作者拍摄于云南楚雄州博物馆,2024年。

^⑫ 清末武定县彝族丝绸女褂,衣身为暗紫色提花绸缎。作者拍摄于云南楚雄州武定县,2022年。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同的族群在服饰穿着、装饰工艺及文化象征等各层面互相交融并不断产生着新的观念和意义,服饰也成为一种族际间文化交融的象征符号,镌刻着民族交流共进的生动印记。

(二) 风俗教化促进文化互动

风俗的变迁创造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也带来文化意义的多样性和选择性。统治者对于西南地区风俗教化的引导和崇儒向学的政策推行,同样推进了武定彝区文化的交流交融。

成于上的学风与化于下的民俗构建,是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互动交流的良好基础。自明代武定土官凤英之时便意识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19]”的重要性,在保持自身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同时,接受其他文化的浸润并注重对于风俗的引导。史料记载凤英“延师教学,习读经书,自是民多慕之,因陋之俗稍革,而近府乡塾,习汉字者亦多^[20]。”为中原文化在武定彝区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直至清代,康熙“圣谕十六条”中提出的“隆学校以端士习^[21]”,旨在对西南地区通过恢复书院、增添义学社馆并施行科考来推动文化教育与熏陶,武定地区亦是“建立学校以广王化……当今速建学校,集民彝子弟送学习礼。收录其子弟,正所以羁縻其父兄,集数十之彝生,盖有胜于百万之精兵也^{[14][41]}。”是以清代武定彝族一时“富者多聘汉儒为师,习六艺……衣服冠带如汉仪,讳言其夷^[22]。”民风民俗的引导和文化教育的推广,使武定彝族社会进步和文明化进程的加快,促使当地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等诸多领域展现出全新风貌。

在风俗教化变迁的影响之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服饰文化汲取中原农耕服饰文化精髓,其多元复合型特质也在不断理性调适、持续丰富和动态发展中,逐渐稳步融入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系统。

(三) 贸易往来加速文化相融

“一个渠道是中原政权的馈赠与互市,另一个渠道是民间贸易,这就形成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基础^[23]。”云南彝区的快速发展,除政策和风俗上的变迁,还得益于人员往来、商品贸易等多形式的经济生活促成的各民族交流交往,并逐渐形成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清代云南地区商业发达,主要得益于西南丝路与茶马古道的开发,云南彝族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也因此更为密切,多个民族在此迁徙、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走廊地带,并逐渐产生了“文化通道”的联通属性。川

南和滇东是古代南方养蚕及纺织品的中心,蜀地生产的丝绸很早便成了远程贸易的重要商品,后来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就是由这条古商道发展而成的。而云南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道,成为了往来商旅重要的中转站,促进蜀地代表性的丝绸向世界各地的流通。在繁盛的商贸下,光绪年间大理“三元”“裕和”为代表的大型商号和四川、临安、迤西的三大马帮的兴起,更加促进了云南对外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拥有经济实力和运输力量的各类商号,基本上支配了云南民间重要的商贸活动,金沙江航道开通之后,来滇的商贩更是受到了沿岸村寨夷民的欢迎,使得蛮獠渐被教化,并出现了“现在商旅负贩赴金沙、乐马等厂贸易者,千里之内往来不绝^[24]”的繁荣景象,商旅们在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进入到物产丰富、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滇地。

这些繁盛的贸易交往,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说,它不仅是一条商业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与传播之路,族际互动之下不同民族的服饰元素相互交流与共享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成为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重要部分。

四、结语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武定彝族人民对于艺术实践、生活实践的阐述,更是蕴含着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人口分布上的交错而居、文化民俗上的包容共蓄、经济贸易上的相互依存,推动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从多元凝集成一体”的密切关系。基于这种密切的交流,他们不断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服饰中的养分,在服饰结构造型上,延续了中华民族服饰结构系统中“十”字形平面结构这一各民族交往下产生的“最贴近和共生关系的胎记”;服饰装饰纹样在沿袭源自自然环境和原始宗教的彝族传统纹样基础上,与清代“趋吉”的审美观念产生共鸣,追求具有丰富象征性和美好寓意的吉祥纹样;而在服饰工艺上,对以三蓝绣、盘金绣为代表的服饰工艺的吸纳以及纺织技艺和服饰面料的变化,更是武定彝族兼容开放的实证。武定彝族服饰以其造型结构的共通、纹样装饰中的交流和工艺技术中的融汇,创造了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的服饰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服饰文化状态。通过服饰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也得以传承并延续,为中华文化认同的构建发挥着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侯官响. 汉楚同风: 明清楚雄与中原的文化交融[J]. 商业文化, 2019(13):84-91.
- [2] 丁文江. 漫游散记[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102.
- [3] 陆韧. 明代汉族移民与云南城镇发展[J]. 云南社会科学, 1999(6):65-71.
- [4] 刘建波. 彝族洪水神话中的共同体叙事研究[J]. 民族文学研究, 2024,42(1):26-36.
- [5] 杨甫旺. 云南彝族土司史研究[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7: 51.
- [6] 傅恒. 皇清职贡图[M]. 影印本. 沈阳: 辽沈书社, 1991:617.
- [7] 李泽奉, 刘如仲. 清代民族图志[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7:154.
- [8] 刘瑞璞, 陈静洁. 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少数民族编[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3:6,23.
- [9] 刘瑞璞, 魏佳儒. 中国古典华服结构的格物致知命题[J]. 服饰导刊, 2015,4(3):17-20.
- [10] 罗兰. 符号·记忆·情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探析[J]. 深圳社会科学, 2023,6(5):115-121.
- [11] 何耀华. 武定凤氏本末笺证[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83.
- [12] 周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再现——以青海土族盘绣图案文化符号共享现象为例[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49(1):32-40.
- [13] 朱程程. 传统盘金刺绣技艺与服装配饰的应用结合研究[J]. 设计, 2022,35(22):154-157.
- [14] 杨成彪.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武定卷[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351,363,411.
- [15] 郑娜娜, 许佳君. 清前中期汉中地区招民垦荒政策与移民迁移[J]. 中国农史, 2019,38(3):104-113.
- [16] 王文成等辑, 江燕点校. 《滇系》云南经济史料辑校[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244.
- [17]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第12卷[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18.
- [18] 钱秉毅. 明代云南少数民族汉文古籍书目[J].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2020,36(2):69-75.
- [19] (明)谢东山修, 张道纂. 嘉靖贵州通志上[M].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328.
- [20] 朱宪荣. 罗婺历史与文化[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23-24.
- [21] 许巧云. 中华民族共同体背景下的清代西南彝族地区的文化教育[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45(2):34-37.
- [22] 杨甫旺. 儒学在彝族地区的传播与彝族社会文化的变迁[J]. 贵州民族研究, 2009,29(5):161-166.
- [23] 方李莉. 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再建构[J].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2022(3):44-58.
- [24] 蓝勇. 清代滇铜京运对沿途的影响研究——兼论明清时期中国西南资源东运工程[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21(4):95-103.